

清代前期贵州人口资料辨析

杨 斌

【提要】 研究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区域的人口,首先就要研究这个历史时期这个区域的人口数量。本文结合具体的历史史料和历史事实,对清代前期的贵州人口作了详细的辨析说明和修正,认为清初贵州人口不是六、七十万左右,也不是一百万左右,而是二百万左右。

【作者】 杨 斌 贵州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实习研究员。

关于清代前期的贵州人口,史籍记载较多,但比较杂乱。有关专家学者也有研究,但差距较大。有的学者把清代前期贵州的人口数修正为:1661年为1076259人;1685年为1065216人;1724年为2119310人;1749~1840年基本都以原始数据为准^①。还有的学者修正为:1661年为600000人;1685年为779400人;1696年为876675人;1724年为1174000人;1732年为1363435人^②。更有的学者则不作任何修正,照搬照用原始数据,认为“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贵州人口已达1718848人”^③,这个数据明显有误。因此,许多数据必须作进一步辨析说明和修正,才能加以运用。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清初贵州的丁口比和口户比。清初,官方并无人口统计,只有人丁统计。人丁数又不是实际的丁男数额,而是“丁银”数额。关于丁口比例,有的学者以一丁折四口计,有的则以一丁折五口计^④。以一丁折四口者,概以当时户数远少于丁数^⑤;以一丁折五口者,则因“以丁抵户”^⑥。当时贵州有其特殊情况,“唯奉天、贵州以户籍未定,仍丁地分征”^⑦。故清初贵州之户数远大于丁数。如康熙《贵州通志》载:贵州布政司户口原额175335户,人丁原额158290丁。户比丁多17045,多11%。为准确起见,清初贵州之丁口比,笔者取1:6。但需要说明一点,丁口比1:6仅反映清初贵州在册人丁数与口数之间的关系,而不反映在册人丁数与实际口数之间的关系。因为清初由于战乱及繁重赋税,贵州逃亡、脱漏人口极多,“逃亡犹二倍之”^⑧。同时审丁编银不包括少数民族人口,固“论户口实数有其过之无不及也”^⑨。

关于各历史时期的口户关系,人们多以5折算,这种一刀切的办法恐怕不尽合理。因为各历史时期由于受生产力水平限制,家庭规模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极为密切。连续丰年,社会稳定,家庭规模相应就大。连续灾年,社会混乱,家庭规模则相应要小。清代前期贵州口户

① 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3页。

② 蒋德学:《清初贵州人口考》,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③ 潘治富等:《中国人口·贵州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52、59页。

④ 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3、54页。

⑤ 郭松义:《清初人口统计中的一些问题》,《清史研究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第二辑。

⑥ 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⑦ 《清史稿·食货志》。

⑧ 康熙《贵州通志》。

⑨ 《思南府续志》。

比究竟是多少?很难考证。因为清代前期贵州也多有人丁统计或户数统计,却没有口数统计,如康熙、乾隆《贵州通志》及这时期的一些府志,有口数统计,却又没有户数统计。如《清文献通考》、《钦定大清会典》虽有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户数与口数统计,为629 835户、1 718 848口,前后对比,口数却又明显有误。据《清文献通考》记载,乾隆十四年(1749年)贵州有口3 075 111,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有口3 335 579。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要想对清代前期贵州口户比有一个较为可靠的数据,实乃困难重重。笔者取5.7,根据如下:《明史·地理志》记,弘治四年(1491年)贵州有户43 367,有口258 693;万历六年(1578年)贵州有户43 405,有口290 972;嘉靖《贵州通志》记,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贵州有户118 957,有口512 289;万历《黔记》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贵州有户105 906,有口509 975,又万历三十年(1602年)贵州有户51 212,有口344 180。口户比弘治四年为5.97,万历六年为6.70,嘉靖三十四年为4.31,万历二十五年为4.82,万历三十年为6.72,平均为5.7。以口户比5.7折算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贵州人口数,与以口丁比6折算的人口数相差不大。但需说明一点,口户比5.7仅反映清初贵州在册户数与口数之间的关系,而不反映在册户数与实际口数之间的关系^①。

第二个需要说明的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和雍正二年(1724年)的贵州人丁数。据《清文献通考》卷19《户口》1记载,顺治十八年贵州人丁数为13 839,康熙二十四年为13 697,雍正二年为21 388。以丁口比1:6折算,顺治十八年为83 034人,康熙二十四年为81 182人,雍正二年为128 328人。前后对比,这几个数据明显偏低。明郭子章《黔记》记载,明末万历三十年(1602年)贵州尚有人口344 180。康熙《贵州通志》记载,贵州布政司户口原额175 335户,按口户比5.7计算,康熙年间贵州当有人口90多万。《黔记》和康熙《贵州通志》均为贵州地方官吏编著,应该说基本可信,但也仅为在册人口数,实际人口数可能更多。那么,清初贵州人丁数为何如此偏低?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②:(1)清初几十年战乱及繁重赋税,造成人丁大量逃亡。

“逃亡犹二倍之”。据康熙《贵州通志》统计,贵州实额编差人丁61 592丁,内除三十一、三十五年两年清编抵补外,尚逃亡人丁42 863丁,逃亡人丁占实额编差人丁的69.6%。这是实额编差人丁的逃亡比例,未审丁编银的人丁逃亡同样严重,只是未见诸史籍而已。有逃往四缘山区的,有逃往外省的。据笔者统计研究,黎平为康熙、雍正年间贵州人口密度最大之地,其主要原因,就是有大量人口逃往此地。另据李世平先生统计,清初逃往四川的人,有10%原籍为贵州、云南^③。(2)上述三个数据源于《清文献通考》,是清政府为征收“丁银”而统计的,由于地方官吏敷衍塞责、隐匿脱漏、任意填报,丁数大大低于当时实际丁男数。“一户或有五、八人,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一、二人交纳钱粮”^④。据乾隆《贵州通志》记载,康熙五十年(1711年)编审实额征差人丁21 388丁,与《清文献通考》所记的雍正二年(1724年)人丁数为21 388,相差13年。(3)上述三数据为实额征差人丁,不包括不征差人丁,也不包括千里苗疆的少数民族人丁。(4)清初人丁编审对象仅为16~60岁的成年男丁。(5)清初几十年的战乱,确实造成了贵州人口的锐减。至于康熙二十四年的人丁数为什么较顺治十八年还低?其主要原因是吴三桂叛乱(1673~1681年),造

① 杨斌:《清代前期贵州各府人口资料辨析》,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② 蒋德学:《清初贵州人口考》,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③ 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

④ 《清文献通考》卷19。

成了贵州人口的大量死亡和逃亡,“自镇远以上数百里,人烟断绝”^①。

第三个需要说明的是,康熙《贵州通志》所记的“户口原额”。有的学者认为即为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的贵州户数^②,恐怕没有确凿证据。原文记载“户口原额175335户,人丁原额158290丁,内除原不征差并随田带派亦不征差人丁96698丁外,实额编差人丁61592丁,内除三十一年、三十五年两年清编抵补外,尚逃亡人丁42863丁7分1厘1毫6丝”^③。这里的“户口原额”与“人丁原额”当指同一年代,而“人丁原额”显然并非康熙三十五年之人丁数,也非康熙三十一年之人丁数。考康熙《贵州通志》的编著时间,共计有两次,一次是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称康熙(前)《贵州通志》,为吴中蕃、潘训撰。此书经吴三桂叛乱,几已散失。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巡抚卫既齐搜求此书,“仅得抄本数册,字漫漶不可读”^④。于是在卫既齐倡导下,吴中蕃、李祺等再修,成书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称康熙(后)《贵州通志》。尽管康熙(前)《贵州通志》“散佚无存”,但康熙(后)《贵州通志》必以康熙(前)《贵州通志》“抄本数册”为蓝本无疑。故上文所记“户口原额”与“人丁原额”当为康熙十一年(1672年)之贵州在册户数与丁数。

第四个需要说明的是,雍正十年(1732年)的贵州人口数。据乾隆《贵州通志》记载,雍正十年贵州有272687户,以口户比5.7折算,有1554300口。而康熙五十年(1711年)贵州仅有实额征差人丁21388丁,以丁口1:6折算,仅128328口。前者仅为在册户数与口数,后者仅为“实额征差”人丁数与口数,尽管较当时贵州的实际人口数都明显偏低,但前后比较,两者相差太大。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两者统计口径和统计标准不同,康熙五十年为“实额征差人丁”,雍正十年为“户”,前者较实际人口数比后者更低。(2)雍正五年(1727年),割四川遵义府五州县隶贵州,收湖南粤西归天柱、荔波二县,割永宁县隶四川,割威宁州可渡桥西地隶云南;雍正十年又收四川叙永厅赤水河南地隶毕节县,又割毕节县赤水河北地隶四川,使贵州净增了27834户^⑤。实际上还不止此数,因为不仅逃亡、隐匿人口在遵义等新增地同样存在,而且收湖南粤西归天柱、荔波二县“原无户口”,事实上是不可能的。(3)清代初年,清政府在贵州开展了大规模的屯军垦田运动,“驻一郡之兵即耕其郡之地,驻一县之兵即耕其县之地,驻一乡之兵即耕其乡之地”^⑥。据统计,康熙年间,贵州设有9个卫、109堡、屯军8930户,明代后期贵州垦田数不过90余万亩,到雍正二年已达1454569亩^⑦。大规模的垦田运动,促进了贵州经济的发展,其结果便带来了人口的大量增殖。(4)大量屯军、官吏、流民进入贵州,也增加了贵州人口。(5)这期间战乱较少,社会相对安定,有利人口增长。(6)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颁布了:“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人口隐匿现象有所减少。

第五个需要说明的是,雍正十年至乾隆十四年(1732~1749年)的贵州人口数。据《清文献通考》记载,乾隆十四年贵州有人口3075111,而雍正十年只有272687户,1554300口。17年间,贵州人口净增1521000,年均净增89460,年均增长率为40.95%,

① 《贵州通志·前事志》。

② 蒋德学:《清初贵州人口考》,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③ “尚逃亡人丁42863丁7分1厘1毫6丝”是原始材料。在贵州地方志中这类记载比较多见,不是实际的丁男(人)数额,而是丁银数额。

④ 康熙《贵州通志·卫既齐序》。

⑤ 乾隆《贵州通志》。

⑥ 《清圣祖实录》卷24。

⑦ 潘治富等:《中国人口·贵州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第59页。

与长期以来封建社会人口年均增长 10% 左右极不相称^①。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 雍正十年，贵州开始以保甲为单位编审人口，“将零户编甲，独户迁移，十户为甲，十甲为保，逐村清理，逐户稽查”^②，把大批逃亡、脱漏人口清理入籍。但人口隐匿现象仍不可避免地存在，因为此时编审人口之目的仍为征收“丁银”；加之改土归流后，土官虽为流官所代替，但土司、土目仍拥有大量田地；“归流后，仅存夷目，所管田土，非夷目不能当买租佃与人”^③。至乾隆六年（1741 年）用“大小男妇”计算，开始定义比较明确的人口统计，人口隐匿现象方逐渐减少，是故人口大增。(2) 这期间“游民日聚”，“各省之民趋黔如鹜”，加之清政府为了防止少数民族反抗，继续屯军，增加了不少人口^④。贵州按察使介锡周奏报：“彼时计米一石，不过四钱五分及五分有零……，各郡邑人烟疏散、铺店无几。自雍正五、六年以来，米谷丰收之年要七、八钱一石，岁欠要一两一二至二两等”^⑤，即为移民大增之故。(3) 这期间，贵州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久荒之土，一亩收数倍；古州丹江，禾长八尺，穗五、六枝，豆大如栗”^⑥，人口增殖进入高峰阶段。

第六个需要说明的是，乾隆十八年（1753 年）的贵州人口数。据《钦定大清会典》记载，贵州是年有户 629 835，口 1 718 848。口数除统计有误或记载有误外，别无他释。有的学者以口户比 5 修正为 3 149 175，有一定道理，但也并非当时贵州的实际人口数。因为此时的贵州，人口隐匿现象还尚未完全消除，629 835 户、3 149 175 口也仅为当时贵州的在册户数与口数。

第七个需要说明的是，乾隆三十二年至五十一年（1767 ~ 1786 年）的贵州人口数。据《清文献通考》记载，乾隆三十二年贵州有人口 3 441 656。据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记载，乾隆五十一年贵州有人口 5 151 000。此 19 年间，贵州人口净增 1 709 344 人，年平均净增 89 965 人，年平均增长率为 21.45%，此增长率在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史上也明显偏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 从全国来看，康熙末年就已开始了“摊丁入亩”，但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贵州才最后实行。“摊丁入亩”基本废除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人头税，人口隐匿再无必要。乾隆五十一年的人口数为“摊丁入亩”后统计数据，基本可靠，而乾隆三十二年的人口数为“摊丁入亩”前的统计数据，明显偏低。

(2) 邻省“游民趋黔”尚在继续，如镇远、铜仁、黎平等地，乾隆后期便从湖广、江西迁入许多流民^⑦。(3) 经过顺、康、雍、乾近百年的经济发展，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出现了“乾隆盛世”，全国人口发展达到高峰阶段，年平均递增率为 13.3%^⑧。

从以上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清代前期贵州人口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二十四年（1661 ~ 1685 年），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的影响，贵州人口曲折发展。第二阶段从康熙二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二年（1685 ~ 1757 年），贵州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有所发展，移民大量涌入，人口发展较快。第三个阶段从乾隆二十二年到道光二十年（1757 ~ 1840 年），由于受社会生产诸因素限制，人口与耕地、人口与粮食的矛盾开始显现，贵州人口缓慢发展。

① 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1 页。

② 《贵州通志·前事志》卷 19。

③ 《黔南职方纪略》卷 3。

④ 蒋德学：《试论清代贵州的移民》，人口研究，1983 年第 5 期。

⑤ 《清实录·高宗实录》卷 311。

⑥ 《圣武记》卷 7。

⑦ 周春元等：《贵州古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40 页。

⑧ 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 53、54 页。

根据以上所叙,现将清代前期的贵州人口数修正如下:

表 清代前期贵州人口修正数

纪 年	公元 (年)	原始数据		资料来源	年平均增长率 (%)	修正后人口数 (人)
		丁(户)	口			
顺治十八年	1661	13 839 丁	—	《清文献通考》卷 19《户口》1	—	2060 400
康熙十一年	1672	16 678 丁	—	康熙《贵州通志》	17.11	2483 100
康熙二十四年	1685	13 697 丁	—	《清文献通考》卷 19《户口》1	-15.03	2039 400
康熙三十五年	1696	19 992 丁	—	乾隆《贵州通志》	34.98	2976 800
康熙五十年	1711	21 388 丁	—	乾隆《贵州通志》	4.51	3184 700
雍正十年	1732	272 687 户	—	乾隆《贵州通志》	4.88	4087 500
乾隆十四年	1749	—	3 075 111	《清文献通考》卷 19《户口》1	5.24	4467 300
乾隆十八年	1753	629 835 户	3 149 175	《钦定大清会典》	5.97	4574 900
乾隆二十二年	1757	—	3 335 579	《清文献通考》卷 19	14.48	4845 700
乾隆二十七年	1762	—	3 411 148	《清文献通考》卷 19	4.49	4955 400
乾隆三十二年	1767	—	3 441 656	《清文献通考》卷 19	1.78	4999 700
乾隆五十一年	1786	—	5 151 000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	1.57	5151 000
乾隆五十二年	1787	—	5 158 000		1.36	5158 000
道光十年	1830	—	5 377 000		0.98	5377 000
道光二十年	1840	—	5 410 035		0.61	5410 035

修正说明:

① 所有修正数均以逆推算出。计算公式: $a = \frac{b}{(1+c)^n}$, 其中, a 为首年人口数, b 为末年人口数, c 为年平均增长率 (包括自然增长率和机械增长率), n 为年数。

② “摊丁入亩”基本上废除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人头税,人口隐匿再无必要,故“摊丁入亩”后的人口统计基本可信。贵州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最后实行,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的人口数是实行“摊丁入亩”后的第一个人口统计数,比较可靠。故以乾隆五十一年的人口统计数为末年人口数,算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人口数,再以乾隆三十二年的人口数为末年人口数,算出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的人口数,依次类推。

③ 乾隆三十二年及以前的人口(丁)统计虽难以置信,但由于统计口径、统计标准等基本一致,故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应基本可信,由此算出年平均增长率,计算公式: $c = \sqrt[n]{\frac{b}{a}} - 1$ 。但乾隆三十二年至五十一年(1767~1786年)、雍正十年至乾隆十四年(1732~1749年)、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十年(1711~1732年)之间,由于统计口径、统计标准不同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比例关系却不可信,均以前一年均增长率减去前一年均增长率与后一年均增长率之差的平均数。计算公式 $c = c_1 - \frac{c_1 - c_2}{2}$, c_1 为前一年均增长率, c_2 为后一年均增长率。因为通过 $c = \sqrt[n]{\frac{b}{a}} - 1$ 计算出来的清代前期贵州不同时期的年均增长率,除了清初几个特殊的年代外,基本呈现一条不规则的抛物线,乾隆十八年至二十二年(1753~1757年)的年均增长率为此条不规则抛物线的最高点。

④ 康熙五十年(1711年)及以前的人口数不包括雍正五至十年领土变动所增加的人口数。计算过程:首先算出康熙五十年的实际人口数(包括领土变动所增加的人口数),除以雍正十年之户数(272 687户)与各府新增户数(69 518户)之差,再乘以由于领土变动所增加的户数(27 834户)。最后再用康熙五十年的实际人口数(包括领土变动所增加的人口数)减去这个积,就是康熙五十年的实际人口数。

⑤ 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十一年(1661~1672年)和康熙二十四至三十五年(1685~1696年)较高的年均增长率,是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吴三桂叛乱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贵州田土荒芜、人口锐减后,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的补偿性生育)和机械增长率(迁移增长率)所致。限于篇幅,另作专文讨论。

⑥ 康熙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672~1685年),贵州人口发展出现了负增长局势,是由于吴三桂叛乱及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贵州人口的锐减。

(本文责任编辑:徐培英)